



人類學與心理學科際合作研究

風俗之厚薄，繫於一二人也。學術之趣向，又何嘗不在開風氣之先的領航員。

民族所首任所長凌純聲，自 1955 年籌備處成立以來，即帶領同仁開

啟了臺灣原住民文化、臺灣漢人社會之田野考察工作，同時也建立了以中國大陸及環太平洋各民族做為參照比較的研究方向。凌純聲且於 1959 年，當選中研院第三屆院士。繼任所長李亦園於 1970 年上任後，鑑於他在哈佛大學修習期間，觀察到該校人類學家、社會學家與心理學家相互合作，開創社會科學綜合理論的卓然有成，³ 再加上他力求為民族所建立學術特色的用心，⁴ 訂定了本所「科際合作」的發展方向。這一學術視野，使得民族所研究團隊的學科背景趨於多元。⁵ 1971 年，民族所以合聘方式邀請臺灣大學心理系教授楊國樞加入，奠定了本所人類學與心理學跨學科對話的基礎。李亦園和楊國樞也於

1984、1998 年分別榮膺院士。

其實，早在 1970 年春天，李亦園與楊國樞兩人便以「國民性」(national character)為題，發起了一個促發社會科學科際綜合研究的討論會。這不是一個尋常的研討會，而是歷時一年多連續性的討論會。第一階段採雙月會，每兩個月聚會一次，以擬定個人論文大綱為討論核心；1971 年，待與會者完成論文初稿後，再進入第二階段，每兩週聚會一次，針對各篇論文進行討論，並將研討意見錄音臘稿，送交作者做為修訂參考。⁶ 1972 年，在李亦園與楊國樞的共同編輯下，出版了專刊乙種第四號《中國人的性格：科際綜合研究》。專刊

的論文作者除了人類學與心理學外，還包括來自史學、社會學、哲學，和精神醫學的專家學者，他們分從中國道統、經典史籍、家族主義、儀式、民間故事、兒童教養、經濟型態、問卷調查等視角，來探討中國人的性格，或是中國人的理想型人格（如君王、知識分子），或是現實生活中所呈現的民族性（如農民、大學生）。雖說「國民性」或「民族性」這一探索文化模式與人格心理學的議題，在當時已不若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那麼「火紅」（如 Ruth Benedict 的《菊花與劍》），但李亦園和楊國樞所主編的《中國人的性格》一書，確是臺灣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界科際合作的先河，更是臺灣人類學界與心理

學界首次攜手，共同探索「跨界思維」的可能性。

民族所在 1970 年代隨後所推動的研究計畫，多少都帶有科際合作的氛圍，包括文崇一主持的「臺灣北部地區社會文化變遷與適應研究」（1971～1975），和耶魯大學教授兼史語所兼任研究員張光直所籌劃主持、總計畫執行委員會設在民族所的「濁大計劃」（1972～1976）。然，前者以探討社區變遷與現代化模式為主，後者則是將文化史和生態學的概念帶入臺灣的考古學研究中。人類學和心理學的對話，在其中所扮演角色仍屬末微。

人類學和心理學之間進一步的科際

合作，要到 1980 年代末期，在民族所研究團隊陸續加入了幾位心理學的生力軍後，才於 1990 年代再次醞釀，並於 2000 年初期開花結果。其中，最顯著的成果當屬胡台麗、許木柱、葉光輝主編的《情感、情緒與文化：臺灣社會的文化心理研究》（2002）和余安邦主編的《情、欲與文化》（2003）。這兩本論文集分別脫胎於 1999 年的兩場研討會：「情感、情緒與文化」和「敘說、記憶與歷史：以情與文化為核心的論述」。兩者不約而同地以「情感」為議題。這樣的研究取向，一方面是基於研究人員自身在田野經驗中的體會，認識到情感乃深入文化現象的重要取徑，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國際學界的研究趨勢。

受西方笛卡爾身心二元論的影響，情感向來被視為是個人內在的心理感受或生理反應，而不是體現社會關係的文化議題。但自 1970 年已降，一些人類學家在田野工作中，開始體察到非西方世界中攸關情感的文化意涵。1986 年，Catherine Lutz 和 Geoffrey M. White 在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所發表的 “The Anthropology of Emotions” 一文，⁷ 更是水到渠成地賦予了「情感」在人類學領域中，名正言順的研究空間。

「情感」這一議題在國際人類學界最早是以「文化建構論」的面貌現身。胡台麗、許木柱、葉光輝所主編的《情感、情緒與文化》論文

集，即是在這樣的理論關懷下，從臺灣的實例出發，重新檢視臺灣本土研究中，長期受到忽視的情感與文化心理面向，包括情感的教化、情感的美學、情感的類型，情感的表達、抒發、張力與治療。從兒童的恥感教育到父母的情緒理念，從排灣族鼻笛所流露的情思到舞蹈藝術工作者的情感論述，從失親的哀傷到民間信仰中的牽亡治療，甚至療養院的病患，從出家眾的母女情結、在家信徒的懺悔情感，到日常生活的情緒評估等。本書標題中，同時出現「情感」與「情緒」，也彰顯出該論文集主編擴展情感指涉的企圖心：情感的意義與表意雖是文化建構，但有時也遊走在文化之外，直指個人的身心狀態。

如果說《情感、情緒與文化》一書的貢獻，在於建構臺灣本土情感人類學的民族誌和理論論述，余安邦主編的《情、欲與文化》一書，關懷的是如何開拓本土心理學的多元典範思維：從湖南江永女書的「訴可憐」到臺灣寡婦的情蘊敘說，乃至娼妓現象，從情感的認識論到倫理學，從民間的牽亡情懷到程朱、陸王的「以身控心」和「身心一如」，從章回小說《西遊補》到張愛玲的《封鎖》和加拿大女作家 Margaret Atwood 的《強暴幻想》。本書議題之廣泛，也顯見主編余安邦企求在人類學領域之外，亦援引西方現象學分析、中國宋明理學的身心情理說，乃至文學表述，來豐富吾人對於情、情慾做為一種心理過程，所

彰顯的社會事實與文化現象。

上述兩本論文集的作者群雖說涵蓋了人類學家與心理學家，但以學科對話為要旨，承繼李亦園、楊國樞科際合作精神的，當屬本所於2011年成立的「音聲發微」研究群。著眼於民族所匯聚文化人類學與心理學學者於一堂的殊勝因緣，該研究群以帶動人類學和心理學對話，從而多維度觀照「人」的生命萬相為學術使命。研究群於2012年舉辦了一場國際研討會「從相逢到交融：人類學與心理學的對話與激盪」，並於2014年出版由劉斐玟、朱瑞玲主編的論文集《同理心、情感與互為主體：人類學與心理學的對話》。和上述兩本

論文集一樣，本書也觸及情感，但側重有別。本論文集的重點不在彰顯情感做為研究議題的迫切性，而是將情感視為是文化與心理的交界面(interface)，以此探索人類學與心理學的對話空間；同時，藉由這兩門學科觀點的交互激盪，開展情感在「文化建構論」之外的理論視野：探討情感如何在實踐、學習、展演，甚至非知立場與聆聽的藝術中，「感」同「身」受。在感同身受之餘，又如何經歷情感的「入、住、出」，爾後超越；既是情感的超越，也是主體的相互涵化與觀看視域的拓展。情感的相濡以沫如是，涉及認知與感知的「同理心」亦復如是。

同理心的概念約莫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源發於美學、心理學與精神分析等領域。此後雖蓬勃發展。但在1980年代的人類學界，卻一度沉寂，主要原因是美國知名人類學家Clifford Geertz對此一概念所持的保留態度，他認為研究者只能透過表徵體系來理解，而無法直接感知其報導人所感知的文化現象。⁸然，1990年代鏡像神經元(mirror neurons)的發現，卻為「感知」提供了生物學的基礎，開啟了認知與推理之外的另一條理解之路：在腦中直接映射(mirror)所觀察的現象，當下心神領會，也就是所謂的「同理心」。劉斐玟、朱瑞玲主編的《同理心、情感與互為主體：人類學與心理學的對

話》，一則檢視不同文化中攸關同理感知（觀看、聆聽、敘說、共做、學習、身受）的民族誌材料，從臺籍慰安婦、臺灣的宗教放生儀式，和臺／美兒童的教養文化比較，到太平洋所羅門群島的島民、緬甸古典音樂大師、中國西南的阿卡女巫師，乃至世界唯一的婦女專用文字「女書」。二則反思「同理心」的相關理論思辨，在人類學、心理學，兼及精神分析與哲學視域的照見下，發展出思考同理心的四大理論面向：「虛」（文化、生活空間）、「時」（個人的生命經歷、歷史過程）、「教」（社會化、人文素養與知識傳承），和「權力關係」（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師生、父母子女、醫者與患者、書寫與被書寫

者）。⁹本書也是對臺灣人文、社會科學先輩，嘗試探索科際合作視域的禮敬。

民族所過去六十年來，在人類學與心理學學科視域的相互滋長下，一方面茁壯了臺灣的本土研究，另一方面，亦不時透過理論思辨與民族誌的建構，參與國際學術論述。人類學與心理學科際合作研究，既代表了民族所身為臺灣學術舵手對國際學界的回應，也反映出民族所同仁開展思考界域、深化理論向度的嘗試與自我期許。

——劉斐玟撰文

- 3 1944年，哈佛大學的Gordon Allport和Henry Murray，兩位帶著人文取向的心理學家，離開心理系，和社會學家Talcott Parsons及人類學同仁Clyde Kluckhohn，一起加入了由社會系改組成立的社會關係學系（Social Relations Department）。該科系在Parsons強力主導下，培養出許多傑出學者，也完成一部社會科學理論的合著：*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1951)。而李亦園先生正是在社會關係學系最為蓬勃發展的1950年代，前往哈佛大學修習。關於哈佛社會關係學系的發展，請參見Barry Johnston, "The Contemporary Crisis and the Social Relations Department at Harvard: A Case Study in Hegemony and Disintegration"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29:3 (1998), Pp. 26-42。
- 4 黃克武訪問、潘彥蓉記錄，《李亦園先生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5），頁142-143。
- 5 蔣斌，〈民族學研究所〉，刊於《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中央研究院2008），頁28-49。
- 6 請參考李亦園，〈序言〉，刊於李亦園、

- 楊國樞主編《中國人的性格：科際綜合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1972），頁 i-iv。
- 7 Catherine Lutz and Geoffrey M. White, "The Anthropology of Emotion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5 (1986), Pp. 405–436.
 - 8 Clifford Geertz, "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 On the Nature of Anthropological Understanding," in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Pp. 55-70.
 - 9 「虛」、「時」、「教」乃是援用莊子所謂的「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莊子·秋水》）。

